

科学可以凌驾于民主和自由之上吗？

——科学沙文主义批判

蒋劲松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要: 科学沙文主义与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科学沙文主义夸大和神化科学共同体的诚实和能力, 禁止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决定提出质疑, 阻挠社会公众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审查; 以科学作为真理的垄断者, 把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排斥与之竞争的其他文化传统。现代科学不是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事业, 而是耗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 需要对社会公众负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 应当与人类其他文化传统进行公平、自由竞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应当与国家权力分离。只有这样, 才能保障社会的思想自由, 才能保障科学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健康发展。科学不能凌驾于民主和自由之上。

关键词: 科学沙文主义; 科学; 自由; 民主; 后现代主义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 在当代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 差不多已经成为标志政治正确性的基本共识。然而在科学占据现代社会话语霸权的今天, 如果说对于技术活动, 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和干预, 已经得到认可的话; 对于科学活动是否需要权力制衡和监督, 却远远没有能成为共识, 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讨论。

从费耶阿本德批判科学沙文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科学沙文主义主要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1. 科学共同体在知识上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 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决定是绝对可信赖的。2.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科学是最为正确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形态, 科学是衡量各种文化传统的唯一标准。^[1]从某种角度上说, 科学沙文主义是科学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缺省配置”, 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思想背景。

然而在另一方面, 在政治生活领域中, 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现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却是: 自由与民主。所谓民主, 是强调在公众事务上应该由公众做出决定, 不能仅由少数人决定公众的利益。所谓自由, 则是强调在一切只关乎个人的领域中, 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 应该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信仰, 自由决定给子女提供什么文化的教育, 应该可以自由决定接受什么传统的医疗保健服务。

本文赞同费耶阿本德的立场, 认为科学沙文主义与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从当代科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 以及现代自由社会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出发, 作为公共决策组成部分的科学知识需要经过社会公众的质疑和审查, 牵涉到科学共同体集团利益的科学决策需要外部监督和干预,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知识应与其他文化传统公正地、自由地竞争。只有这样, 才能保障社会的思想自由, 才能保障科学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健康发展。

一、科学与民主

科学沙文主义认为, 在科学知识方面, 科学共同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决定是不可质疑的。因为, 我们相信如下的假定: 1. 科学家是清心寡欲, 淡薄名利

的圣人，科学家们主观上是要向社会提供可靠的知识。2.科学共同体拥有非常可靠的监督、纠错和管理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的发生，能够有效避免科学活动中的违规现象的发生。3.科学活动是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独立的活动，外部力量缺乏必要的知识与判断能力。因此，外部力量的介入，会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所以，科学共同体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或者说是我们有可能获得的最可靠的研究成果。因此，社会公众应当相信和接受这种结果，任何对科学共同体依科学研究程序所获得的结论怀疑的行为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但是，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会公众不可以怀疑和审查科学共同体得出的结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证明科学家从总体上来说道德更加高尚的统计证据。科学活动本身对于参与者的道德要求也并无特别要求。如果说，在历史上科学家曾经在某些阶段平均道德水平比较高，那也绝非是科学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于当时科学研究活动相对来说无利可图，科学研究活动中没有涉及太多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即使如此，科学家弄虚作假的现象也不绝于史。像牛顿、莱布尼兹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深深地卷入到关于微积分发现优先权的争夺，甚至也上演了安插自己人对对方缺席审判的丑剧。而今天科学研究活动中所渗透的利益更是无所不在！科学家行为规范“祛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则的实质，恰恰是在承认科学研究渗透利益的前提下，强调从制度层面控制和避免因各种利益而导致的偏见和错误。^[2]所以，不能假定科学家总是尽其所能为社会提供真理。

其次，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决定固然可以清除许多违规行为。但是，并不能彻底禁绝一切违规行为，在极端情况下，共同体的集体决定甚至有可能变成集体分赃或者对弱势派别的歧视打击。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适时介入，则内部的不轨行为或者不合理决定难以得到迅速的纠正，当维护科学精神的内部力量弱小处于受压制地位时，科学精神也难以得到维护。必要的外部干预有时能纠正科学共同体的偏见和错误。例如，中国解放后政治势力对医学的干预，虽然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但是对于中医在医疗实践和医疗教育体制中地位的恢复就产生了积极的作用。^[3]尤其是进入大科学时代，现代科学中所涉及的利益巨大，范围广泛，仅仅依靠基于学院科学的行规和传统往往已经难以完成其预想的功能。

再次，由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耗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科学已经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公共事务。科学共同体成为公众的受托人，其工作是否满足公众的要求，有责任接受公众的审查。科学家在对科学事务上发表其专业性的咨询意见时，社会公众有权利进行审查，以调查其是否滥用了公众的信任，是否牺牲了公众的总体利益来满足其团体的特殊利益。在科学家知识具有优势的领域内，我们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力始终应该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待科学家就像对待帮我们疏通管道的工人一样，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但要提防他们向我们多要钱。费耶阿本德的告诫很值得记取：“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忠告是，**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4]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揭露过美国医学协会的超级垄断行为。作为资深医生的代表，协会的医疗教育和医院理事会负责审查美国各医学院每年可以招收学生的人数。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是，根据医学院的各种软硬件的条件，确定合理的招收人数，可以保证未来的医生的素质，从而保护患者的利益。但是，由于委员会成员的角色冲突，在医生数量较为充足，医生收入有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这些资深的医生就容易认为，目前医学院的条件不适宜招收太多的学生，从而导致未来医生数量下降，医生的收入可以进一步上升。更可耻的是，他们总是用各种手段来限制更多的人获得开业医生的资格。如他们向各州建议，开业医生只能是美国公民。有时又要求颁发执照的考试必须用英语。1933年以后，大量医生从德国、奥地利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进入美国，可是1933年以后的5年内，得到允许在美国开业的外国毕业的医生，数量和1933年之前5年内相同，这说明美国医学协会的垄断政策效果非常的好！这可能就是美国的医疗费用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许多的重要原因之一。^[5]

另外,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事件上专家的意见未必比利益相关的公众更有发言权。在社会文化普及的今天,将普通公众视为一无所知的阿斗的观点实在是过于落后了。公众的“本土知识”可以成为科学家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6]。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假如普通的人们准备‘进行某种艰苦的研究’,他们便可以发现专家的错误,这是任何陪审团的基本假定。……法律还假定,外行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理解专家的程序、发现他们的错误。这一假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审判中得到了证实。”^[7]

在社会公众完全听命于科学共同体,没有任何质疑权利的情况下,科学之于公众就像一个黑箱,公众对于科学缺乏了解,往往会对科学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产生不必要的疑虑。一旦相关科学成果在应用中出现差错,或者达不到预想效果时,公众往往就会对科学和科学界产生不满和不信任,甚至产生反科学的情绪和行动。而如果通过对于科学实行民主管理和监督,则可以加强公众和科学界的交流,减少公众对于科学界日益增长的误解和敌意,可以化解潜在的反科学情绪,从而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健康的和谐的环境。^[8]

二、科学与自由

现代科学不仅是工具,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在日益成为盘踞各种话语之上充当裁判角色的超级话语。今天科学却享受着法律上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其他文化传统的知识,只要与近代科学传统相抵触,就会受到法律的排斥。全民义务教育以及目前的教育内容安排完全由现代科学界主流观点所决定,这一事实表明了现代社会的公民,尽管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却无一例外地必须都要接受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在医疗方面,不仅医疗保险只能接受现代科学的主流话语所支持的治疗保健方式,即只有现代科学所认可的医疗方式垄断了庞大的医疗市场,而且即使患者不顾医疗保险的歧视,自己决定接受传统的医疗模式,法律也会强行干预所有不符合科学世界观的治疗方式。^[9]

如果我们接受现代国家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话,那么国家就应当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分离。科学要想获得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就应该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通过竞争来获得这种优势。众所周知,现代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此前人类文化积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也有非常灿烂的文明,甚至有些成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近代科学技术也难以达到的。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其他文化传统在与自然打交道方面不如近代科学,但是我们永远没有理由说这些传统不可能再次复兴。迄今为止,主要起源于西欧文化的近代科学的极大成功,可以说在不同文化与自然打交道的竞争中占得了先机。但这决不意味着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不同理论和实践的其他文化传统,就彻底丧失了和近代科学传统竞争的资格。科学哲学长期以来试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清晰明确的界线,迄今尚未成功,这说明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化。^[10]因此,罢黜百家,独尊科学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常常会把科学发展很有希望的方向扼杀在摇篮中。

划界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按照罗蒂的看法,这首先是因为人们想获得一种把意见(δοξα)与真理(αληθεια)分开,把实践上的谨慎考虑与对真理的非个人的和非视角主义的追求区分开的“形而上学安慰。”这样一种绝对、可靠的安慰,传统上是由宗教提供的。随着宗教影响的衰落,人们逐渐认为道德和审美是主观的趣味问题,只剩下由科学所担保的真理是人类与实在的最后一丝联系。^[11]

所以,人类的思想越是解放,文明越是发达,对科学在心理上的依赖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把科学活动理想化和神圣化。但是,罗蒂指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使得“科学家们像神学家们那样远远离开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牧师和哲学家,成为青年

的道德导师。”^[12]他认为，“西方文化今日需要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13]不再具有先前人们强加给它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准宗教的作用了。科学再也没有必要把任何人类活动作为文化基础和中心了。

李约瑟先生对于科学排斥其他文化的话语霸权满怀忧虑和担心，他说：“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保持正义而进行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天，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那些科学家们把宗教以至哲学一概都斥为无稽之谈，一心只想充分发挥他们人作为数学物理学家或实验生物学家的才能，还要引导别人走同样的道路；而对于政治问题闭口不谈，也不想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是怎样利用他们的创造发明的。这样的科学家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成为‘麻醉剂’，成为暗杀犯，成为一切无辜人民的毁灭者；其危害之烈，远远超过了犹太的希律王。所以，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过份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这种说法；今天‘科学的麻醉剂’也正在造成同样严重的危害。”^[14]

特权和垄断的地位的长期保持，对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利因素。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由于科学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竞争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不断奋发进取，综合创新所致。如果我们满足于此目前所建立起的科学传统，沾沾自喜，排斥一切其他竞争者，不注意吸收其他文化的宝贵财富，动辄以反科学和伪科学为名排斥诸如中医等文化传统，就会重蹈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覆辙。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早期基督教教徒面临异教的迫害为基督教教义努力辩护时，教徒们对基督教的教义的理解和接受是全心全意的，而当基督教已经确立其合法和统治地位，不需要再为之努力斗争时，教徒们对其所信仰的教义就开始漠不关心了。^[15]同样，科学沙文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在缺乏强有力的外来刺激的情况下，科学就会沦为固守传统的保守势力，而且科学的支持者们也会由于缺乏论战的锻炼，逐渐将科学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传统，从而丧失了对于科学精神的真正理解。

强烈的、普遍的科学沙文主义使得科学与真理等价，所以要想获得话语权，必须获得科学的名义。这样就迫使所有非主流的话语除了公然挑战社会文化的秩序外，只有自称为“科学”的唯一道路。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辩论之所以变得如此激烈和复杂，正如吴国盛所言，这场争论是“现代性背景下欠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之争”。^[16]也正是因为科学沙文主义的背景假定使得科学这个符号被认为代表了文化优越性，从而使得纯粹学理的探讨与价值评判纠缠在一起，使得本来很清楚的问题越发复杂，难以澄清。

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沙文主义的话语霸权要为中国伪科学的盛行负责。除非摒弃科学作为唯一真理的垄断者的错误假定，否则伪科学现象永远无法彻底消除。正如庄子所说，“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篋>）恰恰是由于对某些符号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才会导致大量严重的作伪事件的发生。所以庄子激烈批评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因如此，老子才提议，“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道德经》19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3章）只有我们放弃科学沙文主义，科学才不至于成为大家一致推崇和力图借用的符号，才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普遍假冒科学的社会现象。

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国家不应该只认同一种特殊的传统。当然这种分离决不意味着国家不应该支持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手段的科学，只是说国家不应该将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作为公众的民主决定的结果，科学可以得到国家的预算的倾斜支持，作为特定时期社会主导的知识和话语，科学在教育 and 医疗方面也可以获得法律上的特殊地位。但是必须要

时刻认识到，这种地位应该是民主决定的结果，是不同传统自由公平竞争的阶段性结果。而现在的情况是：“科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机构；它现在是民主政体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我们接受或拒斥科学思想的方式与民主的决策程序根本不同。我们接受科学定律和科学事实，我们在学校中讲授它们，使它们成为重要的政治决策基础，但没有对它们进行检验，更没有把它们付诸表决。科学家并不把它们交付表决，至少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外行当然不能对它们进行表决。”^[17]在民主讨论的元层次上，不同文化传统，乃至被主流科学界称为“反科学”和“伪科学”的传统和实践都是与科学平权等价的，不管其过去竞争结果如何，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都有资格继续展开与科学传统的公平竞争。

如何实现科学和国家的分离呢？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国家和科学的分离，不应该通过激进的政治行动来完成，而应该是一种渐进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许多人尚未达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所必须的那种成熟性，尤其是那些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因为，“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对非常基本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汇集必要的信息，他们必须理解不同传统的目的以及它们在其成员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18]而这种成熟性必须通过公民的首创活动才能慢慢培养起来。培养成熟性，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需要与各种不同的观点保持联系，显然，它需要我们摆脱科学沙文主义的思想束缚。

卢梭认为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人人都是善良的天使才行。康德则反驳说，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理智，他们也能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只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就可以使彼此各种毁灭的力量彼此制约，彼此抵消，就能实现普遍理性。^[19]我们今天在讨论科学和技术产生的社会后果时，也应该从这个思路来考虑。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是天使，还是魔鬼，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有效地监督和制衡的制度与文化安排，这样即使科学是魔鬼也能表现出天使的善良。而如果我们奉行科学沙文主义的话，那么科学即使是天使也会因为骄傲和野心堕落为魔鬼。^[20]

参考文献

- [1]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EB/OL] Verso Editions/NLB, London, 1978, 74-76. 本文快要完成时，恰巧读到了“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两位华人当中难得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科学研究发现优先权的争议以及相互指责，正好给本文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动例证。该文刊载于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上，具体栏目为“一阶科学传播：科学纵横”，网址为：<http://www.csc.pku.edu.cn/topics.php?n=1&t=40>
- [2] 曹南燕. 论科学的“祛利性”[J]. 哲学研究. 2003(5). 63
- [3]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10-111
- [4]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04 脚注
- [5] 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张瑞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第143-153页。
- [6]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92. vol. 1. 283-301. 在英国坎布里亚羊事件中，牧场主们的“本土知识”最后证明比科学专家们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识更加可靠，牧场主们也比科学家们具有更高的内省能力。
- [7]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04
- [8] Alan Irwin,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Citizen: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Biosciences"[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1. vol. 6, 2. 不顾公众一再表示的疑虑，来自英国科学界的观点一直坚持认为，疯牛病不可能对人类产生危害，结果1996年爆发的疯牛病危机，引起了公众对科学的强烈的不信任感。
- [9] 如在美国等国家中医的治疗活动常常是非法的。
- [10] 加德纳, 西方伪科学种种[M], 贝金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4., 6, 91. 在这本以揭露和批判伪科学为主要目标的著作中，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存在并不存在截然区分的鸿沟，而是处于逐步过渡的连续统中。
- [11] 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M], 47

- [12]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 5
- [13]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 中译本作者序, 北京: 三联书店.13
- [14] 李约瑟, 从亚洲观点看科学与宗教,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 劳陇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170-171
- [15] 约翰·密尔, 论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42-46
- [16] 吴国盛, 边缘与中心之争,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J], 2000(4),
- [17]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76, 77.
- [18]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05
- [19]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25
- [20] 作为一技术性的实在, 某种特定科学主张的有效性可以验证, 所以其过分夸大的破坏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 我们可以置而不论。但科学沙文主义的最大问题是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作为特定知识形态的“骄傲和野心”, 这是我们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的。科学成为偶像, 危害大过商品化的歌星之类的偶像, 那些偶像经常换, 很少真有人信。但科学却有可能成为超稳定的偶像。

Can Science be Beyond Democracy and Liberty?

----A Critic on Chauvinism of Science

Jiang Jings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Chauvinism of science is incompatible between with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 Chauvinism of science boasts and glorifies the honesty and capability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forbids the public raising doubts about judgment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baffles social public's necessary supervising and censoring over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on; counts science as the occupant of truth, which holds discourse hegemony of ideology, suppresses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ther than Science. Modern science is not for amateur, but a business consumed large mount social resources, so it should answer for social public. As a special cultural tradition, science should compete with other human cultural traditions fairly and freely. As a kind of ideology, science should be from state power. Only thus can freedom of thinking be safeguarded,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other cultural traditions can be safeguarded. Science should not be beyond democracy and liberty.

Key Words: Chauvinism of Science; Science; Democracy; Liberty; Postmodernism